

● 语言哲学

○ 引进与诠释

## 被“延异”的语言<sup>\*</sup>

——德里达对索绪尔的批判再审视

姜永琢

(西南大学 重庆 400715)

**提 要:** 德里达批判索绪尔是“语音中心主义”,他的符号理论最终同意“先验所指”的古典要求。这一批判是否准确,“延异”与“文字”在多大程度上拓展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思想,值得质疑。索绪尔认为语言中只有差异,因此他的研究对象既非“语音”,更不会“语音中心主义”。对能指与所指的划分所带来的矛盾,索绪尔有着清醒的认识,语言单位也只是假设,差异原则足以禁止所指滑向“先验所指”。实际上,索绪尔已先于德里达在符号中完成了对于在场形而上学的颠覆。

**关键词:** 语音中心主义; 先验所指; 索绪尔; 德里达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4)06-0001-6

### Différanced Language

— Re-examination on Derrida's Criticism about Saussure

Jiang Yong-zhuo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The criticism that Saussure belongs to phonocentrism and that his theory finally accords with the traditional requirement about transcendental signified is doubtful. Besides, in what degree have *différance* and *archi-écriture* brought improvement in Saussure's semiology theory? According to Saussure's theory, there is only difference in language. Therefore what he researched is not sound, and it is incorrect to regard his theory as phonocentrism. Saussure emphasized any unit in language is not a real existence but a supposed one, which states clearly that he is aware of the contradiction which was brought about by dividing signal into two parts: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The difference principle has already guaranteed that signified will not become transcendental signified. In fact, Saussure has completed in semiology the overturn of metaphysics of presence before Derrida.

**Key words:** Phonocentrism, Transcendental Signified, Saussure, Derrida

“索绪尔对语言本质的思考,对当代许多理论和哲学研究都有重要意义。与卡尔马克思、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弗里德里希尼采一样,索绪尔是改变了人们认识语言和知识方式的最重要的历史人物。”(泰勒 2007: 446)“索绪尔通过他的语

言理论有效地使许多西方的思维方式变得激进了,不仅是表现在语言学方面……由于语言体系中的成分只有在依赖差异关系时才具有意义,才能发挥其功能,因此,它们在其本性上根本是否定性的,这一结论深刻地颠覆了关于本质、本体和意

<sup>\*</sup> 本文系重庆市社科基金项目“后现代性的逻辑根基——索绪尔思想在哲学视域中的重新阐释”(2012BS04)和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项目“后现代性的逻辑根基——索绪尔思想在哲学视域中的重新阐释”(SWU1309253)的阶段性成果。

义的假定。”(同上:122)

这是《后现代百科全书》对索绪尔的评价。这与我们从德里达那里了解到的索绪尔截然不同,如果将这段表述中的“索绪尔”替换为“德里达”,估计我们也不会提出异议。关于索绪尔与德里达之间的思想关联,国内有过一定的讨论且声音一致,然而对照国外索绪尔研究者的观点,这些讨论是否建立在对索绪尔的独立阅读与客观评价基础上,尚待推敲。就如 Russell Daylight 所说,关于“德里达对索绪尔的阅读,我们常常提及却没有完整的考证。”(Daylight 2012: 2)

本文在对索绪尔的3次《教程》特别是《普通语言学手稿》和德里达相关论著阅读基础上,从具体概念关联的细处入手,重新审视德里达对索绪尔的批判,质疑其解构主义对索绪尔思想的扩展程度,呈现出他们思想内在关联的另外一种面貌。文章所得出的结论与以往的认识不尽相同。

### 1 语音中心主义批判的来源

德里达1967年的3部著作对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展开了集中批判。他将这种形而上学称为“在场的形而上学”,在“在场的形而上学”中,原初性“真理”等同于“存在”,“存在”又等同于“在场”。德里达认为,这是西方形而上学坚持的一个偏见,将真理的所在地视为事物本身对意识而言的纯在场。在场的形而上学在历史上有多种表现形式,“从柏拉图到卢梭,笛卡尔到胡塞尔,一直是以这样的方式运行,将善置于恶之上,积极置于消极之上,纯洁置于不纯洁之上,简单置于复杂之上,必然置于偶然之上,这不仅仅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形式,它是形而上学的危机,是最持久、最严重、最深处的危机”(Derrida 1998: 236)。它产生于逻各斯中心主义并求助于逻各斯中心主义。它将逻各斯(理性)当做真理和意义的中心,并相信真理能为主体经过理性的内在之光而知晓,主体正是通过逻各斯(理性)来把握事物的在场。因此在德里达看来,在场的形而上学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是融为一体的。又由于“逻各斯与语音的原始的本质的联系并未割断”(德里达 1999: 13),正如我们所熟悉的逻各斯的基本含义就是“所言之事”,因此德里达说“逻各斯中心主义也不过是一种语音中心主义,它主张言语与存在的绝对贴近,言语与存在的意义绝对贴近,言语与意义的理想性绝对贴近”(同上:15)。语音中心主义就成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同义词。

从在场的形而上学到逻各斯中心主义,再过

渡到语音中心主义。德里达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历史的阐述本身也将批判策略自然呈现出来——对文字学的考察成了语音对原初文字施加压抑与暴力的揭示。较之与意义直接贴近的语音,文字一直作为语音的辅助而被压制,它是对有声语言再编码的视觉符号,是“能指的能指”,是辅助系统。文字唯一的存在理由在于表现语音。相对于语音的这种特权中心,反思文字就是对语音中心的自然消解,也是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有力批判。“根据这一主张,关于逻各斯的形而上学,关于在场的意识的形而上学,必须将文字作为它的死亡和它的根源来反思。”(同上:105)“书写不是符号的符号,除非有人认为它是所有符号的符号,而这一观点更加准确。”(Derrida 1976: 43)那么,文字是否有成为另一个中心的危险呢?它是否会替代语音,再次全景透明地呈现意义,成为在场的另一个确定性表现?全然不会,德里达非常清楚将形而上学的对立的简单翻转过来并不能真正挑战试图推翻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框架和立足点。(Derrida 1978: 280)因此,德里达的文字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指在与一种“表达实体”发生关系之前的文字。原初的文字对意义的“延异”特质,使意义表现为踪迹的踪迹。或者说在原初文字中意义从未表现,从未现身,它甘愿冒虚无主义的风险,只留下踪迹的踪迹。因此,它绝不会为任何在场提供保障,不会为理想性的意义提供栖身之所,不会成为形而上学的支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认为,“这不是一个用书写中心主义来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问题,一般地说,也不是用一个中心去反对其他中心的问题。《论文字学》不是对文字学的捍卫和说明,甚至也不是恢复所谓文字的地位。这不是有关将文字的权力、优越性或地位还给文字的问题”(德里达 2004: 14)。而是通过在界限两边的一番活动,带来内部领域的变动,而实现的颠覆。

德里达的颠覆是从索绪尔入手的。首先,他认为索绪尔也表现出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和黑格尔那里一脉相承的“语音中心主义”。他关于语音与文字关系的论述更直接贬斥了文字,突显出语音中心的立场。其次,德里达认为虽然索绪尔关于符号的论述:(1)能指与所指一体两面的不可分性,(2)符号的差异原则“起着一种绝对决定性的批判作用”(同上:22)。但是,能指与所指的区分本身从一开始就意味所指脱离能指单独在场的可能性,因而最终同意了“先验所指”的古典要求,陷入在场的形而上学之中。最后,德

里达在索绪尔符号概念内部提出“延异”——一个不是概念的概念用来解构意义的在场,实现对形而上学的颠覆。

## 2 既非“语音”更不是“中心”

文字的确不是索绪尔关注的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索绪尔是“语音中心主义”的。索绪尔认为语言学要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个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索绪尔 1980: 48)。索绪尔排除了文字,单独地将“口说的词”确定为语言对象,在德里达看来这秉承了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对文字的偏见,是明显的语音中心论。但是索绪尔认为“口说的词”的形式也即符号的“能指”(Signifier)不是指一个声音,同样这个“口说的词”的内容也即符号的“所指”(Signified)甚至也不是任何观念或者概念。因为“语言不可能有先于语言系统而存在的观念或声音,而只有由这系统发出的概念差别和声音差别”(同上: 167)。也就是说,作为语言符号(口说的词)的两个部分,能指与所指都只是差别,而不是任何实体本身,无论是声音还是概念。既没有语音为中心,也没有语音与意识的直接本质的贴近——因为索绪尔认为语言中就不存在语音实体、意义实体。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口说的词,是两个差异之间而不是实体之间的联系,即能指差异与所指差异之间任意性的统一。因此,索绪尔明确表示,“语言状态给语言学家的研究只提供了唯一的一个中心对象:形式与寓于形式中的概念之间的关系。例如,假定这个语言状态提供了概念本身的,或形式的,或组成形式的语音的第二个对象,这都不对”(索绪尔 2011: 74)。这段文字清晰地显示,语音不是索绪尔的对象,更不是中心,不仅语音不是,概念也不是,任何实体形式都不是,甚至于先于实体的差异也不是。因为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学的中心对象虽然可以表达为,两个差异之间的关联——能指的差异和所指的差异之间的任意性统一,但是这两个差异本身却不具有存在的根性,“差别一般要有积极的要素才能在这些要素间建立,但是在语言里却没有积极要素的差别”(索绪尔 1980: 167)。一方面,能指的差异需要所指的差异来决定,而另一方面,所指的差异又需要能指的差异来决定。可见,索绪尔不仅不是“语音中心”的,甚至不是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因为他所看到的语言符号的面貌,实则是一个将空(非实体性的差异)也空掉(互为存在)了的“空”(没有存在根性的差异关系)。

## 3 文字与形而上学

索绪尔之所以明确地将文字排除在语言系统之外,是因为:(1)人类语言存在一个不可否认的现象,即存在着许多没有文字的语言,这些语言也应该是语言学关注的对象。作为语言学家的索绪尔不能无视这一现实,将文字与语言混淆不做区分,而作为哲学家的德里达却可以有这样的自由。(2)出于跟德里达相同的目的,即反对在场的形而上学。《普遍语言学教程》第六章记录了索绪尔对文字表示不满的4点缘由,可以概括为:正是文字的永恒和巩固、明晰和持久的特质为一种写下的存在、在场的形而上学提供了栖身之所,规则的先在性与权威性,是这种形而上学的产物。索绪尔努力将文字排除在语言系统之外,同样基于反形而上学的考量,他论述“语言符号的性质”时,一开篇就对语言的形而上学认知提出了质疑“这种观念有好些方面要受到批评。它假定有现成的,先于词而存在的概念”(索绪尔 1980: 100)。如果不将文字排除在外,就很难破除与之对应的先验概念。索绪以语音形式(音响印象)而非书写形式为符号的能指,打破了语言对实体性的依赖,进而揭示了语言中只有差异没有实在的普遍差异原则。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的是,为何以音响印象而非文字为能指,就可以摆脱实体性?因为音响印象不等同于物理声音,它不是任何声音实体。试想一下,我们每一次说出同一个语词,或者不同的人说出同一个词时,在声音的特质上一定是有所差别的,可这不影响它们成为同一个词。这说明声音实体上的差别并不影响音响印象的成立。“声音本身作为物质要素是不可能属于语言的。”(索绪尔 1980: 164)语言能指(音响印象)是以与系统中其它语音的差异为条件的。这些其它的语音也同样依靠差异而非实体来确立自身。符号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它的一个部分——能指是差异而非实体,它的另一个部分所指也同样是差异而非确定性的实体。语言系统中的成分,从本性上看都是否定性的,或者用索绪尔的话说是“负性”的。因此,“语言中没有符号,也没有意义,而只有符号的差异和意义的差异”(索绪尔 2011: 58)。如果说,语言中既没符号也没意义的存在,那么有关本体、本源与意义,以及与在场相关的指涉和形而上学的假设,就已然被倒转了过来。那么符号是什么呢?符号只是为意指行为提供了能够运行的框架,“符号是一个空洞性的存在”(屠友祥 2011: 193)。

然而,出于对西方形而上学历史的考察,德里达对索绪尔的方法存有质疑。在德里达看来,任何与语音相关的理论,都维持着与形而上学的联系,因为语音中心主义就是在场的形而上学最初的表现。语音转瞬即逝的特征弱化了能指的外在性,“能指似乎抹去了自身或者变得透明了,从而允许概念按其本来面貌呈现出来,并且只指涉它的在场而不是他物”(德里达 2004: 26)。语音的这种可穿透性成全了意识与所思之物的直接在场。“语言具有本质上的自我遗忘性。”(伽达默尔 1994: 69)“正是语言把我们投向了语言能指的东西,它通过它的运作本身在我们眼前隐匿自身,它的成功在于它能够让自己被忘却,并在语词之外为我们提供进入作者思想本身的通道,我们因此在事后相信我们是与作者不用说话地、精神对精神地联系在一起。”(梅洛-庞蒂 2005: 9)德里达以原初的文字代替语音,试图以痕迹的表现阻挡透明性。但德里达却必须依赖索绪尔的普遍差异原则,简单地使用与语音对立的狭义的“文字”概念,并不能承担所有的颠覆,它必须被赋予符号普遍差异性,才能展现出“延异”的特质,这就是德里达新的文字概念。在延异的文字中,意义的赋予最终成为一种踪迹的形式游戏。索绪尔的差异原则正是德里达“延异”的真实出处。

#### 4 延异与差异

德里达从未对“延异”(différance)做出过定义,因为任何定义都将是形而上学的。德里达从词形的构造上提供了一些说明。différance 是对法语词差异 difference 的改写,通过引入“a”,“唤起了空间上的‘间隔’,这个间隔就是拖延、迂回、推迟的原因”。又“通过这种推迟,直觉、知觉和完善(总之,与在场的关系以及对一个在场实在和一个存在物的指涉)总是被延迟”。(德里达 2004: 33)因此,“间隔”引起“拖延”,“拖延”又带来“延迟”。间隔是如何引起推延带来延迟的呢?德里达解释为“通过差异原则来延迟”(同上)。什么是差异原则?“一个要素要发挥作用和有所表征,包含或传达意义,惟有在踪迹中指涉另一个过去的或将来的要素才能达到。”因此说,差异原则使意义永远不可能在场,一个要素想要达到意义,总要指涉另一个不在场的要素才有可能,而另一个不在场的要素,也只有通过指涉另一个不在场的要素,无穷往复。这样,意义最终就只留下踪迹的踪迹,意义的赋予成为踪迹的形式游戏。这就是德里达所谓的“延异”。

“延异”一词词形异常特殊,可见德里达是费尽了心思,然而如上所述,其承载的思想并没有太多的原创性,使得延异得以可能的机制——“差异原则”实际上直接来自于索绪尔。索绪尔对符号中普遍差异的揭示可以总结为:语言中没有任何要素是积极的存在,它只有依靠与其它要素之间的差异,才有存在的可能。因此,语言中既没有符号,也没有声音,也没有意义,有的只是符号的差异,声音的差异,意义的差异,而所有这些符号也好,声音也好,意义也好绝不在差异之前而存在。“所以我们说,语言中没有任何出发点,或者任何固定的参照点。”(索绪尔 2011: 27)索绪尔也因此将语言学当做一个另当别论的科学,“就它所面对的对象从未有自身的现实而言,或者除了其他要考虑的对象之外;它们的差异之外,或者精神得以把任何种类的差异与基本的差异联系起来,但是它们彼此的差异使它们各自存在:否则绝对没有任何存在的基础(substratum)”(同上: 54)。这些文字与德里达对于延异的表达惊人的相似。“无论是在文字还是言辞的话语中,任何要素都不能不联系另一个本身并不是单纯在场的要素,才能起到符号的功能。这种联系意味着任何一个‘要素’,无论是声音的还是字符的,都要牵连到它自身内部同一系统中其它要素的踪迹才得以构成的……无论是诸要素还是系统本身中,都根本不存在单纯的在场和不在场。一切都是差异,都是踪迹的踪迹”(Derrida 1982: 37)。索绪尔又将差异原则简化为一个等式: $(\text{符号}/\text{意义}) = (\text{符号}/\text{另一符号}) = (\text{意义}/\text{另一意义})$ (索绪尔 2011: 27)。这个等式中,我们直观地看到,意义被表示为一个符号对另一个符号的指涉而带来的,朝向另一个意义的无限推迟。索绪尔甚至直接表达了意义在场的不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说,想穷尽一个词中所蕴含的概念是一项根本不可实现的工程……对词所蕴含的意义加以探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恐怕得穷其一生的精力”(同上: 65)。

可见,意义、本体、本源这样的概念在语言符号中成功地被取消了在场性,表现为不断的延迟。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同时也被德里达以外的其他哲学家所承认,比如同样受索绪尔影响的利奥塔、福柯、克里斯蒂娃等等。那么,德里达提出“延异”和“文字”的必要性在哪里?德里达对此的回答是,“这一概念(指文字)的优点(只要它处于某种解释性语境包围之中,因为它和其他概念要素一样,并不只表示它自己,也不只以自身为满足)就

是在原则上中和‘符号’的语音主义倾向,而事实上通过从整个‘文字实体’的科学领域(超出西方界限之外的文字的历史和体系,它的重要性不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我们至今还没有注意到它,或者瞧不起它)中解放出来抵消它”(德里达 2004: 31)。也就是说,延异之文字可以中和并抵消索绪尔语言符号理论中的语音主义倾向。如果德里达一定要认为索绪尔是语音中心主义,那么他就必须指出索绪尔符号理论同形而上学的直接联系之处,否则就是没有内容的指责。“在什么程度上符号学的规划仍然保持在形而上学之内呢?”(同上: 34)对此德里达的答案是“先验所指”。

### 5 是“所指”但不是“先验所指”

在德里达看来,索绪尔依然保持在形而上学之内的原因是在他思想中不自觉地暗含了对“先验所指”的认可。“保持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严格区分(这是一种本质的和合法的区分),所指和概念的相等直接揭示了思考一个所指概念本身的可能性,这一概念对思想来说是简单在场的,它独立于语言,也即独立于一个能指系统的关系。”(同上: 24)德里达根据自己的逻辑断定,保持能指与所指的区分,就无法斩断与先验所指的联系。而将符号区分为能指和所指两个部分,是索绪尔提出普遍差异原则的前提,虽然普遍差异原则是批判性的(这一点德里达是认可的,并应用到自己的文字概念中),但是它的前提却是形而上学的。因此,在索绪尔的结论和前提之间存在着方法上的缺陷。这个方法论上的矛盾,产生于“他(索绪尔)极力用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来的概念来批判形而上学传统。”(同上: 23)能指与所指在德里达看来,是斯多葛主义的延续,要用这一对概念来批判形而上学,注定是要失败的。如何逃出形而上学的困境,德里达指出方法在于“同时既要划定产生这一概念并使之有服务于自己的系统的界限,又要放松这一界限,并由此在某种程度上让符号从它的土壤中脱离出来。”(同上: 22)德里达认为,索绪尔从区分符号的能指、所指的那一刻开始,就必然遇到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界限,而他并没有适时地放弃这一对概念,所以才最终绊倒在策略的失败上。

然而德里达的观点仍然有牵强之处,他过于自信地认为,“所有解构的干预一定驻留在系统中被忽视的基石上”(Derrida 1989: 72)。如同他将语音中心主义的罪名加给索绪尔,他又把这“先验所指”的概念强加给了索绪尔。首先,对于

德里达所提出的策略上的矛盾,也即能所指的区分带来的不和,索绪尔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德里达其实是在重复索绪尔的自我批判。索绪尔说,“由于没有任何单位(人们想象它是属于什么范畴,是什么性质)是建立于他物之上,而只是建立在差异之上,单位其实总是想象的。唯有差异存在。可是,我们必须借助肯定的单位进行研究,否则一开始就无法掌握大量的事实。但是,这些单位(能指与所指)是我们[ ]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仅此而已:一旦提出单位,就等于说人们约定撇开[ ]不顾,以便暂时赋予[ ]分离的存在,记住这一点,很重要”(索绪尔 2011: 71)。索绪尔清醒地指出,能、所指的区分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是为了揭示语言符号的状态,是不得不假设的单位,并提醒大家,它只是假设的单位,“仅此而已,记住这一点,很重要。”看样子,德里达没有记住这样的提醒,特别地把所指当做独立的单位,认为它可以先于一切,脱离能指单独存在,并从中推出先验所指。

索绪尔对于先验所指的否定,也不仅仅停留于上述表述,事实上,索绪尔反对任何概念、意义的先在,这一点跟维特根斯坦的意义使用论相近,但是索绪尔比后者多出了系统差异观(Roy Harris 1988: 132)。他在《手稿》中反复强调,语言中没有符号,没有意义,只有差异。这个差异有别于精神所感的差异,它是一个完全消极的差异,如同德勒兹所强调的是在同一之前的差异。为了更彻底地否定意义的确定性,索绪尔提出用“价值”来代替“意义”。“价值跟人们所称的意义又有什么不同呢?这两个词是同义词吗?我们相信不是,尽管很容易混淆。”(索绪尔 1980: 159)价值与意义的不同就在于价值永远是相对的,价值是不能根据自身来确定自身的,它必须依靠与其它元素的比较,它不是事物本身,它是与其他事物的比较得出的结果,“我们要借助在它之外的东西才能确定它的内容”(同上: 161)。索绪尔引入价值就是要破除人们认为在语言之先,有观念或者概念的存在。意义的产生取决于差异中的价值,并不是预先存在为语言所表达(Thibault 1997: 20)。如果说这样的索绪尔会同意一个脱离符号对于思想来说是直接在场的先验所指,那只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

德里达语音中心主义也好,文字也好,延异也好,最终的目标都指向在场。延异就是一场游戏的开始,在这个游戏中,在场永远被取消了可能性。关于这场游戏,索绪尔先于德里达描述“那就是符号在一给定时刻依据其差异而具有的符号

游戏。想从这符号游戏中孤立出意义来,而其实这符号游戏只代表着符号概念上的差异和相和。另一方面想从这游戏中孤立出形式来,这完全是种错觉”(索绪尔 2011: 22)。关于语言中的存在,或者引申来说,关于差异与同一的关系,索绪尔这样看,“我们过于匆忙地认为语言成分确实存在,而实际上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一种成分拥有这种假设的存在——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没有这种关于存在的虚构,人的精神永远无法把握如此庞大的差异,而关于这些差异,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我们都找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参照点”(同上: 53)。可见,有关踪迹的游戏、在场与存在,索绪尔都有过相关的文字表述。如果这些还不能洗去语音中心主义和在场形而上学的罪名,那么下面这段话应该会让争辩沉默了:“存在(etre),什么都不存在(rien n'est),至少(在语言学领域内)没有绝对的存在……这个是那个(ceci est cela),这一判断的基本形式立刻会引起众多的质疑,应当问以何种名义区分和限定‘这个’或‘那个’,因为没有任何对象是自然地限定或给定的,没有任何对象是确定无疑的此在(etant)”(同上: 69)。

## 6 结束语

如果德里达对索绪尔有所拓展,那么就是他提出了“原初的文字”概念。他认为,这一文字的优势在于中和并抵消语音中心,能够更为彻底地颠覆形而上学。也让德里达之后的思想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写作之于言说的重要性。但是索绪尔作为语言学家,他必须尊重事实——世界上 70% 的语言都没有文字。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索绪尔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解构。“一旦我们看到文字学不过是用一种流行的修辞包装过的语言价值的思想,我们就可以看到索绪尔整个解构已经通过诡计被巧妙地执行了。”(Evans 1991: 165)如若不曾将整个形而上学等同于语音中心主义,那么一切的颠覆可能就止步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这也是为什么其他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并非从德里达,而是直接在索绪尔那里就获得了启发。如果索绪尔的失败就在于没有意识到“逾越,维持着最终与形而上学相关的规则的关系,以至于所有逾越的姿态在给我们提供机会的同时,又把我们关在这一封闭体之内”(德里达 2004: 14),那么德里达的成功就在于他事先规定“延异既不是一个词,也不是一个概念”(Derrida 1982: 3),以元语言的方式获得了形而

上学的豁免权。德里达最大的贡献在于实践,他用索绪尔批判一个他所构拟的索绪尔,从而成功地用“德里达”延异“索绪尔”。

## 参考文献

-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手稿[Z].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屠友祥. 索绪尔手稿初检[Z].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 维克多·泰勒 查尔斯·温奎斯特. 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Z].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7.
- 雅克·德里达. 多重立场[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 雅克·德里达. 论文字学[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 伽达默尔. 哲学解释学[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4.
- 莫里斯·梅洛-庞蒂. 世界的散文[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Claude, E. *Strategies of Deconstruction: Derrida and the myth of the voice* [M]. Minnesota: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 Derrida, J. *'Speech and Phenomena' and Other Essays on Husserl's Theory of Signs* [M]. Chongqing: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 Derrida, J. *Of Grammatology* [M].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 Derrida, J. *Writing and Difference*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 Derrida, J. *Margins of Philosoph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 Derrida, J. *Memoires: For Paul de Man* [M].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 Derrida, J. *Limited Inc* [M]. Chongqing: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8.
- Derrida, J. & H. Rouse. *Position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 Paul, J. *Re-reading Saussure: The Dynamics of Signs in Social Life*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 Roy, H. *Language, Saussure, and Wittgenstein: How to Play Games with Words* [M].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 Russell, D. *What if Derrida was Wrong about Saussure?*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2.

收稿日期: 2013 - 08 - 26

【责任编辑 谢 群】